

784.88
5214.3

TOLSTOI

托爾斯泰論

反動

L. L. Annun

譯



南華書店

發行

1928

26463
62点

78485
549

托爾斯泰論

克魯泡特金著
L. L. anon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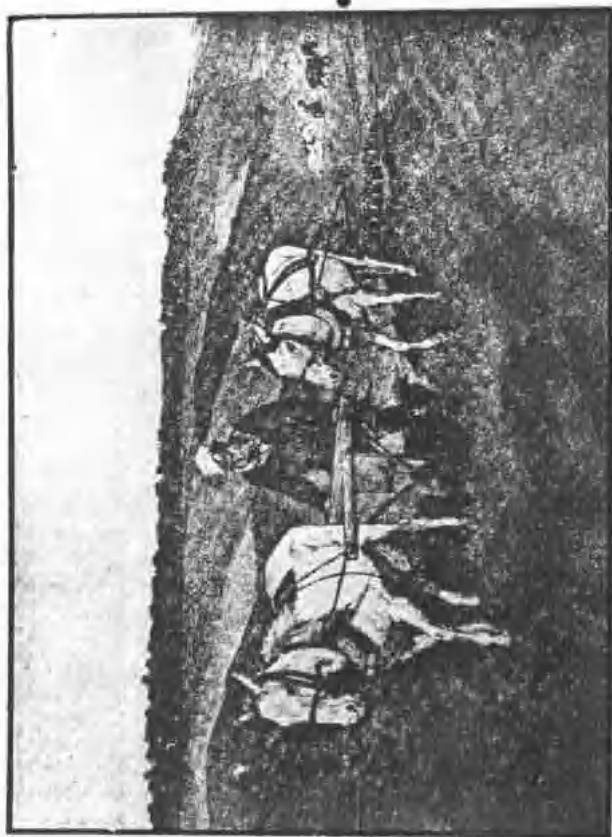


上海南華書店發行



SAW62/12





托爾斯泰躬耕圖

『幼年』與『童年』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即：一八五二年，托爾斯泰的第一篇小說幼年 (Child hood) 便以很謙虛的署名「L. N. T.」出現於同時代者 (The contemporary) 月刊了，而他的童年 (Boyhood) 也便很快地繼續着出現了。那篇短短的小說，乃是一件偉大的成功。牠是滿了的那麼的一種魅力；有那麼的一種活潑，而且打破了當時那種「文商」式的一切形式，這無名的作家，便立刻成爲一個許多人的愛好者。而且他的名字也立被置於屠格涅夫與岡查洛夫之側了。

在各種文字之中，都有非常優美的兒童故事，許多作家都因為寫述着這生命中的一個幼年時代而獲得了他的最大之成功。但是，恐怕從來還沒有一個人，曾如托爾斯泰一樣，童自己的觀點，由內在生活裏寫出兒童的生活來。在托爾斯泰，便是兒童自己發表着他的兒童之感覺，而因為如此，也便可以勉強讀者們以兒童之心來評判那成年人們了。如此便是幼年與童年的寫實主義——即是說，從實際生活中所獲得的事實之豐富——而有一個俄羅斯批評家皮沙勒夫，便以托爾斯泰的這兩篇小說中所包含的原則個為主要根據，發展出了一完全的教育理論。

在某處曾經說過，有一日，當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兩人在鄉間散步的時候，他們行經了一輛舊馬車的旁邊，馬兒正在那寂寞的田間消磨着他的日子。托爾斯泰即刻便鑽入了那馬兒內感覺之中，而開始為牠非常生動地訴說着牠的悲慘的回憶，這使屠格涅夫不由得隱示地應

用那達爾文主義那時的新意義，大聲讚嘆道：「萊俄夫，尼古拉維支（Lyov Nikolaevitch），一定呀，你的祖先中間定是有了許多的馬兒呀！」當講到某一事物的時候，便把自己來完全地同化於那事物的感覺與思想，在這種才能方面說來，能夠敵得上托爾斯泰的人可以說是很少的；但是當講及兒童們的時候，托爾斯泰這種同化的力量，是更得到了牠的最高程度。當他講到兒童們的時候，托爾斯泰自己便已變成一個兒童了。

幼年與童年，我們現在知道，乃是兩篇日敘的小說，其中的情節，祇略有些變動，托爾斯泰在幼年時代是如何的一個人，我們從小孩子伊爾鄧勒夫（Irteneff）便可以大概知道了。他於一八二八年生於那今日已經享有了不朽的從名的雅斯拉雅·波里雅拉莊園之中，在他生命的最初十五年裏，他幾乎是一連無間地住在那兒的鄉村的。我們現在從比魯可夫（Birukoff）爲他所作的「傳記」之中，知道在戰爭與和平

裏所描寫的洛斯托夫（Rostoff）伯爵便是他的祖父，尼古拉斯·洛斯托夫便是他的祖父；而馬麗·波里康斯加雅乃是代表的他的母親，一位生爲佛爾康斯加雅的公主。托爾斯泰在兩歲的時候，便失去了母親，而九歲時父親亦相繼死去了。自此以後，他的教育的責任，便爲一位戚族婦人葉爾古里斯加雅（T. A. Yergolskaya）所照料着，那時仍然是在雅斯拉雅·波里雅拉，而從一八六〇年以後，他便來到加參，受着他的姑母烏西葛華（Yoshkova）的照理，我們聽說，他那姑母的家庭，和戰爭與和平中洛斯托夫的家庭，定必是彼此非常相似的。

托爾斯泰進入加參大學的時候，還祇十五歲，他在那兒兩年住東方科，兩年住法律科。然而，那時兩科的教授們都是那麼空虛的，祇有僅僅的一位教授在他的科目上可以提起這個青年人一些兒超卓的興趣。四年以後，那便是一八四七年，他還祇有十九歲，那時他便已經離開了大學校而回到雅斯拉雅·波里雅拉去。

試改革他鄉中農奴狀況的企圖，此種嘗試，他後來在地主之清晨（*The Morning of a Land Proprietor*）曾以那麼動人的誠實寫了出來以告訴我們。

再次的四年中，他的生活，外表上看來，也好像那些貴族階級中的多數青年一樣，但在內心上却仍然在繼續地反抗着他所不得不生活着的那種生活。從他的台球者之筆記（*Notes of a Billiard Marker*）中，我們信可以洞悉那個時候的他了——當然，其中也不免略有鋪張，而且是戲劇化了的。幸而他到底還是不願忍受那種卑鄙的環境，終於於一八五一年突然地絕他那時所過的那種懶惰的，貴族青年的生活，而跟隨着他的長兄尼古拉斯到高加索來，進入軍隊工作。在高加索，他先頭住在布雅狄哥斯克——那充滿了葉蒙托夫的回憶的地方——直到他經過了必要的致試以後，便在砲兵隊中做得了一個下士官（yunker），於是，便來到德勒克（*Terek*）河畔的一個哥薩克村莊裏頭服

務。

在這些新的環境之中他所積着的經驗與回憶，我們可以從他的哥薩克人 (Cossacks) 裡頭得知。而且，同時也是在那兒，在那曾經深深地感動了普命金和萊蒙托夫的美麗的自然懷抱之中，他才尋得了他的真正的行業。他把他的初次的文學試驗品，幼年，送到同時代者去，而這篇初作，便立刻地從詩人尼克拉索夫 (Nekrasoff)——該雜誌的編輯人——的來信，和格利哥尼埃夫 (Grigorieff)，安南可夫，(Anenkoff)德魯茲林 (Druzhinin) 和柴里雪夫斯基 (Tchernyshevskiy) (他們是屬於四個不同的美學派別的) 的批評之中，已證明得是一篇 chef d'oeuvre (傑作) 了。

克里米亞戰爭與其後

然而，克里米亞的大戰在次年(1853)的年尾便開始了，托爾斯泰不願在高加索的軍隊之中久留而無所動作。他得到了移調多瑙(Danube)河軍隊中的許可，去參加那西力斯德里亞(Silistria)的圍攻，後來又參加巴拉克拉法(Balaklava)之役，而從一八五四年十一月直至一八五五年八月，他便被圍困在塞巴斯托波——也有一部份的時間是在恐怖的「第四堡」，在那兒，他全經歷了那個砲台的英武之守禦者之可怖的經驗。所以他才有講說戰爭的薙利：

他從牠的內部之中認識牠了。他知道戰爭是甚麼一回事，即如是在牠的最妙的方面之下，如這許多從敵人的鎗丸之下所生長出來的砲台與城堡之守衛，等等嚴重而駭異的情形，他也知道。當圍城的時候，他堅決地推辭去作一個參謀部的官職，而甯願仍偕着他的砲隊的士兵們同到那最危險的地方去。

他的雜記，十二月的塞巴斯托波 (Sebastopol in December 1854) ——及至這砲台攻陷之後，又有其他的兩篇塞巴斯托波雜記——在俄羅斯所生的深刻印象，雖然我那時還祇有十二，三歲，但我却是完全記憶得清楚的。這些雜記的本來之性質，都是獨創的。牠們並不是從日記簿上撕下來的幾頁，但是，牠們之忠實於實際，却與日記簿上所記載的一樣，老實說，或許更為忠實些，因為牠們並不祇是表現實際生活之一角——那寫日記的觀察所偶然觸到的一角——却是表現着那全部的生活，那被圍的城堡之中所流行着的思想之變化與生活之習慣

的。牠們表現着一種 *Dichtung* 與 *Wahrheit*，詩意與真實，真實與詩意之交織，其所包含的真實，較之平常所見於 *Novel* 中的真實，還要更多，而其所包含的詩意與詩意之創造，則較之在許多純粹的 *fiction* 作品之中所見到的，也要多些。

外表上托爾斯泰從不會用韻文寫過甚麼；但是當包圍塞巴斯托波的時候，他却曾用軍歌的通常音韻與語調製出了一曲諷刺的歌兒，在裡面他敘述着那些在巴拉克拉法之役了結了性命的軍官們的謬誤。這一首以可稱讚的用通俗格式寫了出來的歌兒，終于未能印行，但是牠在俄羅斯各地却成千成萬份地傳播著，而且還在戰爭的當兒與戰爭結果了以後不久的期間，很流行地被人唱頌着，我們的作者的名字也因此傳漏出去了，但是還有幾分不確實的便是這到底是那些塞巴斯托波雜記的作者呢，或者還是其他的一個托爾斯泰呢。

當托爾斯泰從塞巴斯托波歸來，和議結果

的時候(1856)他部份地住在聖彼得堡，部份地住在雅斯拉雅·波里雅拉。在京城裏，他以塞巴斯托波英雄與新興大作家的資格，爲各級的社會，無論是文學的，是世俗的，所張臂歡迎。但是他那時所過的生活，乃正是他後來除了憎恨的時候以外，再也不忍提起的：那便是，成百的青年的人——與他自己同一階級的那許多侍衛官員與 *jeunesse dorée*——所過的生活，在賭徒，馬販，*Tsigano* 歌唱團和法蘭西的冒險者等人的中間，每日地在俄京的酒館和 *Café schantants* 中之把生活消磨。他那時便與屠格涅夫訂交了，而且時常會見，或在聖彼得堡或在雅斯拉雅·波里雅拉——這兩位大作家的田莊之相隔是不很遠的；然而，雖然他的友人屠格涅夫那時正在彼力地和黑爾參同編着那有名的革命報紙鐘聲 (*The Bell*) (參看第八章)，但托爾斯泰對此却好似全不感興趣的；而且當他和那時最有名的，正爲農民解放，爲着一般的自由而戰越得最力的那個雜誌同時代者的

編輯部中的人們互相熟識了的時候，因為某種緣故，他與那雜誌裏面急進派的領袖們——如柴里雪夫斯基，杜布洛魯波夫，米克哈伊洛夫以及他們的友人——却說是難得怎樣地親密的。

總之，那時候在俄羅斯所進行着的智識的與改革的大運動，似乎是遺給他以冷寞了。他不去參加那些改革的社團。至於屠格涅夫正在父與子中用盡了心力所描寫出的那種青年虛無主義者，或者，到後來在七十年代中那些把口號變成了「民衆化罷」的青年們，托爾斯泰當然更不會願意去曲與聯絡的，然而，其實在托爾斯泰的生涯的最後二十年中，他與他們却是也有許多相同之點的。這種裂痕之緣因如何，我們不能想得到。也許是在我們的少年的逸樂貴族與那些極端德模克拉西的青年們中間，有一條鴻溝把他們分隔了麼？如同杜布洛魯波夫，他在俄羅斯作着傳播着社會主義與德模克拉西思想的工作，更如柴里雪夫斯基的小說要作甚

麼呢？中間的拉克麥托夫（Rakhmetoff）一類的人們，他們過着農民的生活，托爾斯泰在二十年後始才開始宣傳着的，但是他們在彼時候已經是在那麼地在實行着在的。

或者，也許是因為這兩代中間的差別——托爾斯泰，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而那些都是些具有青年時代的倔驕量狹的氣概的二十多歲的人們——是這個使他們互相遠隔了麼？除了這些以外，也許還有理論上的結果麼？那便是兩方在根本的概念上的衝突。進步的俄羅斯急進者，他們那時多都是政府的雅各賓主義的稱揚者，而托爾斯泰那時却是已一個盧騷式的平民主義者——這種趨勢，在他反對西歐文化的態度中，現表得很明白的，特別是當他於一八六一年在雅斯拉雅·波里雅拉的學校裡開始從事於教育工作的時候。

從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六二年這幾年中，托爾斯泰所作出的小說，在他的心境上並不曾射出了多少光明，因為，雖然牠們幾乎完全是自

叙的，但是牠們却都祇是再述着他的生命的很早的年代。如是他便又發表了他的另外的兩部塞巴托多波的戰爭雜記。他的觀察與他的戰爭心理的一切能力，他對於俄羅斯兵士的一切深刻之認識——特別是對於那些樸直而沒有甚麼裝演的英雄們，戰爭的真正的取勝者——以及他對於那關係乎全軍勝敗的軍隊的內在精神的精微之理解；約而言之，那發展在戰爭與和平的美麗與真實之中的每一件事物，現在已在這些雜記之中宣示出來了，無疑地，牠們在全世界的戰爭文學中，都要代表着一個新的界限。